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09年 5期

要 目

月度论坛	CCG·国家形象论坛在京圆满落幕 王辉耀:国家形象论坛开篇辞
国家外交	赵启正:中国需要加强公共外交 王 坚:加强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建议 唐 林:善用西方的规则玩西方的游戏
国家形象	杨福家:世博会中国将拿出什么精神文化展品 钱 宏:中国的国家形象应具备那些内涵
和谐社会	郑永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难以壮大
产业升级	陶庆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注重引进人才
农村改革	温铁军:三农政策改革的新动力
教育改革	杨东平: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
经济转型	汤 敏:谨防中型企业搭小企业优惠政策便车
可持续发展	袁 剑:为中国未来应做好战略转变的准备

www.ccg.org.cn

电话:010—64392122、64392123、64398745、62964489 传真:010—64398744 邮箱:ccg@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2009年5期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总编

王辉耀

副主任/ 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志凯 汤 敏 陶庆华 田溯宁
王波明 薛 澜 钱 宏

执行编辑

邓宗南 苗 绿 常慧敏

编务

王 颖 封 涛 石 月 柏 彦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兴动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邓 峰 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 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海 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何 宁 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胡援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首代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 山 三山公司合伙人

李小加 香港证券交易中心总裁
李 一 瑞士银行(UBS)中国区主席兼总裁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 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林达贤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二飞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刘 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刘松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梅 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沈 冲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
宋永华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局长
孙建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管理司司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谭天星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司长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主席, 创办人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王文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吴 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周云帆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原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睢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 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 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姚 望 博鳌亚洲论坛总监、亚洲教育论坛秘书长
易 珉 GE公司环渤海区总经理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美国百人会会员
张亚勤 微软全球副总裁,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张 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 民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 月度论坛

国家形象论坛在京圆满落幕

回望新中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毋庸置疑，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由衷惊叹。然而，需要思考的是，有着五千年浩瀚文明的中国，未来建设难道只需要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从出口玩具、电视机升级到出口计算机、飞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难道就不需要影响世界、感染世界、自己原创又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文化、理念、语汇？

这样思想的交锋、文化的火花、观念的灵感，来自于2009年9月26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的“国家形象与具有国家感染力的思想观念论坛”。这次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致开幕词，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陶庆华、钱宏主持。

此次论坛云集了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士等近300人。中国政协常委、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会上做了“中国需要加强公共外交”的发言，中国科协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做了“世博会中国将拿出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展品”的演讲。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大国崛起》总撰稿人陈晋，阳光卫视集团董事长陈平，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院长温铁军，《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马立诚，CCTV英语频道《对话》节目主持人和总制片人杨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经济时报》副总编张剑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著名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新华社特约评论员袁剑，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梁振华，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王康，著名评论家王炼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前研究员黎鸣等嘉宾，也在论坛上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对于世界还应贡献更多，中国令世界印象深刻的，不应只有十三亿人口、万里长城、经济奇迹，不应只是出口的服装、玩具、电视机，以及计算机、航天等正在“升级”的高科技产品。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应只有肌肉和硬实力，还必须拥有大脑、思想、文化，有中国自己的精神形象、处世哲学、文化思想，并体现人类的普遍旨趣与

价值，进而成为一个软实力大国，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崛起与复兴。

王辉耀代表主办方致开篇辞时指出：国家形象的形成，一则取决于国内真实的国情与建设，二则需借助于传播的力度与深度，亦即具备怎样的国家感染力、国家传播力、国家影响力。民族国家是由文化、思想、观念等组合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没有精神上的感染力，只有表层经济上的吸引，就很难有由衷的信任与归属感。未来中国输出的不应仅是升级的硬件产品，还应包括文化、思想、形象、精神，让世界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把中国的发展视为自身的“机遇”，进而才可能“和平崛起”。

与会专家学者还表示：塑造国家形象的意义，除了对外减少国家发展的阻力之外，还有对内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国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如何认知中国，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我国以怎样的形象去凝聚十三亿中国人的心？使每一个中国人提起“中国”这个词语，都充满神圣与自豪？又如何让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感受到“和平”与“发展”？甚至中国如何改变整个国际话语体系？只有塑造合适的、符合国民与世界认知的国家形象，未来的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国家形象论坛开篇辞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时，很少有人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以及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奥运会？毋庸置疑，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已经让世界由衷惊叹，也让我们中国人有着深切体会。

因为经济崛起，中国成为了世界舞台的焦点。世界各大论坛，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中国的议题总是热门话题。但是，在世界上，中国的国家形象究竟是什么？即使只谈经济方面的国家形象，中国也只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中国只是低廉物品背后遥远的工厂。中

国常年保持GDP8%以上的高增长，但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除了靠垄断资源形成国内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外，还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上榜。今天的中国，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是十三亿人口、万里长城、经济奇迹，是出口的服装、玩具、电视机，是正在“升级”的计算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然而，由于软实力以及国家形象的不足，这些硬件越发达，令海外就更容易联想到“中国威胁”，因此中国和平崛起的阻力就越大。

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包括外资在内的中国发展参与者，很多人是把中国看作一个“炒短线”的大赌场，谁都想赌一把，但谁都想赌一把就撤离。今天的中国不少人眼里，是全世界的淘金赌场、冒险家的乐园，却还没有成为精神上的寄托之所，梦想的栖居之地。民族国家是一个由思想观念等组合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没有精神上的感染力只有表层经济上的吸引，就难有由衷的信任与归属感。这也是中国未来国家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家形象和国家感染力是相互相承的两个概念。国家形象的形成与塑造，一则取决于国内真实的国情与建设，二则必须借助于对外传播国家的力度与深度，亦即具备怎样的国家感染力、国家传播力、国家影响力。国家感染力涉及国内、国际两个方面：首先应当具有“国内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在于对于涵摄的核心价值有由衷的信仰和信任，最终能使每一个中国人提到“中国”以及这个国家，能充满神圣、自豪并愿意为之奋斗；国际感染力除了要具有中国质地的文化观念贡献世界外，还需要体现人类普遍旨趣与价值，进而能够让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信任、尊敬，欢迎中国的崛起，向往来到中国工作、安家，甚至让世界各地的人才争相渴望归化为“中国人”。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崛起与复兴。

斯当此六十周年的节点，是我们回顾过去，反思当下，展望未来的最好时机。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应只有肌肉和硬实力，还必须拥有大脑、思想、文化；未来中国输出的不仅是硬件和资金，还应有文化、思想、软实力。能被国际与国内正确认识，还只是塑造国家形象起码的要求。更长远的是要由此形成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与建设的和谐环境。新中国建立六十年的风雨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不懈探索，铸就了今天的举世瞩目；未来六十年，有理由相信肩负复兴大业的中国，能在不断变革与调整中实现真正腾飞！

◆ 国家外交

中国需要加强公共外交

中国政协常委、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逐渐走向了世界舞台,表现之一是中国与世界有了千丝万缕联系。单就民间联系而言,中国现在每年有几千万人到外国旅游或访问,这还不包括去港、澳、台的数字。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只有一万人。现在,不仅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政治有一定影响,公民也逐渐成了世界公民。这也表明我们的国家形象,我们的对外表达,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只是以政府的角度和政府的面貌出现,还常常以中国国民的面貌出现,也就为公共外交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公共外交这个词在国外用的很早,在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就公开说,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诉求与表达,很多对美国政策的不理解和对美国政府形象的歪曲,我们要越过对方的政府,越过对方的媒体,直接和外国公众打交道。最早的是美国的和平队,向各国支援青年志愿者、交流文化和可能普及的改善国民生活的技术。还包括美国之音,这并不是美国的国内广播,而是直接面对世界听众。

公共外交的定义极多,但大同小异。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政府对政府的外交算政府外交,而其他场合只要一方是公众,就是公共外交,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就是“政府外交”加上“公共外交”。当然,中国以前不大用这个概念,而是用“民间外交”来表述。那么什么人有权资格担负公共外交?总的来说是那些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人,特别是有机会与外国人交流沟通的人。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向世界公众表达中国,说明中国的国情,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包括他们有兴趣的问题和他们不解的问题,甚至于对中国有所攻击的问题。这种场合和政府外交之间有什么区别?相对比较轻松,相对比较深刻,可以讨论,不仅有表达,还有交流。那么,对于进行公共外交的人需要什么基本功?应该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至少自己所参与领域的国情清楚,例如中国的现状,中国的优势与不足,总之一要能够正确表达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政策。

在这当中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语言，而是跨文化的问题。语言通了不一定能互相沟通。我们很多词汇都是进口的，数理化不用说，社会科学的词汇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GDP等都是进口的。我们是在用进口的砖搭中国的大厦，但这里面，使用语境不同，同样一句话在我们这是正面的，在他们看就可能是负面。例如我们说“无神论者”，人家觉得你没有信仰，天堂都不去，这怎么了得。具备国际感染力的话也不能复杂，否则传递不出去，一定要简单明了，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很简单，“打土豪分田地”就全动员起来了。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我们的做法是经常使用“中国特色”等词语。现在，我们不敢说这些理论能够感染外国，但可以说已经引起外国人的高度注意和争论。

目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在说中国模式，报纸和杂志出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三者之争。事实上，中国模式不是中国人提的，这是2004年雷默提出来的，当然他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等、高效率等特点。华盛顿共识是89年提出的，也叫新自由主义，后华盛顿共识是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我认为如果中国模式是指三十年来我们改革开放的理念、思想、实践，应当更准确的说是中国案例。这个模式是现在进行时，还没有完呢。但我们不参加这个争论，我们愿意介绍我们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但绝没有推广的意思。中国一向认为自己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策。对于外国，当然是外国的国情决定他们的政策，所以从这个道理看，中国没有推广自己。

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很明了，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回答外国对中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想法。仅此而已。有资格进行公共外交的人是能跨文化交流的人，那么具备有感染力的思想，这个很不容易。在当前的国际舆论中，中国的话语权太弱。除了我们媒体的力量还较弱外，中国语言的特殊性，如不能准确地译成外国人容易理解的表达，也得不到传播得效果。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是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创造的，现在在国际上流行的这些名词，这些理念，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很少，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自己就提不出来一条两条？我们就这么贫乏？未必，我想这种思想就蕴藏在我们中国民间，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去进行公共外交。

关于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坚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做了积极的努力，在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国际社会和民众对中国的误读与误解也依然无处不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能理解和把握外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与评估，本文就以如何传播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为例提出完善对外传播工作的建议。

1. 加大调研投入，分析美国人与中国情感联系

若要制定有效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和方案，数据和分析就必不可少。美国人究竟如何感知中国，却仍旧云遮雾障，要解开这个谜团，中国可以采用早已在商业品牌和政治营销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在美国展开一些调研，揭开美国人与中国的情感联系的真相。

2. 在外国主流电视媒体中亮出自己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外国印象和评价的形成，必然受媒体长期熏陶的影响。因此，中国需要更多亮相于外国主流新闻媒体，更好地体现中国的形象和观察视角，或者说当务之急是要在中国政府内部和外部培养一批评论员，使他们能够对有关中国的话题作出快速反应，在包括美国主要电视网如ABC、CBS、NBC、FOX、CNN、PBS等关键新闻节目中，有选择地就有关报道以官方或民间的立场及时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另外，要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一般均为直播）中做到“有效”，就必须改变中国官方对待媒体的传统作法，在电视上表现得自然、简洁、魅力、睿智、真诚，最为重要的是要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而非以我为主，以便能够建立沟通。

3. 传播必须贴近百姓生活

对普通美国公众而言，中国是个地理和文化遥远的国度。要向他们讲述有关中国的故事，就要讲得简单、贴近和视觉化，针对他们的期盼和忧虑做出回应，而不是宏大的政治叙事。才能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情感世界中胜出。此外，中国还可以为美国媒体提供涉及中国文化和社会、或美中关系的新闻题材，选题策划和表达手段要扣准美国受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

4. 与美国新生代建立沟通

在美国青年一代中构建中国形象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长久大计。新生代不受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思想更为开放,常常挑战传统和偏见。但要赢得这个群体,需要不同的媒介策略。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读报纸,也较少关注主要电视网的晚间新闻,但很多人会看晚间电视“脱口秀”、“虚构”类新闻节目以及热衷于社会交往的网站。为与美国青年人建立联系与沟通,除了在美国院校建立孔子学院来介绍中国文化之外,中国也还需要一个坚实的互联网战略。

5. 着力提高海外华人团体的沟通能力

以遍布美国大学校园的中国留学生社团和孔子学院为例,这些组织机构是中国形象在美国的具体体现,也是当地社区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在中美关系和交流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日趋重要。与这些群体保持联系,合理有效地通过当地社区的华人意见领袖,由他们通过地方媒体,以访谈、读者来信、专栏文章等方式,对有关中国的话题作出快速反应,将有助于塑造中国的海外形象。

结语

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主观态度,即使是不甚友好,也不可能先天就有。而且,即使是负面态度,也无论基于客观事实还是主观忧虑,中国都有必要正视和应对。从总体来说,没有哪一种沟通方式一定优于其他方式,一切取决于受众、目标和情境,所以,尽管目的是为自身利益服务,但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要学会用西方人能接受甚至是西方的方式,去说服西方的国家和民众,才能更好地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善用西方的规则玩西方的游戏

中国十届五次全国政协海外代表、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 唐林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已与全球接轨。但在与西方全面交流、全面了解、全面关注的旋律下,中国政府和民间对西方法律的了解却一枝独弱。西方是法治社会,不一定个个三权分立,但司法独立几乎没有例外。中国

目前还不具备改造整个国际游戏规则的实力,也就是说需要经常在现行规则体系下参与国际竞争。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何“知彼”?我认为掌握并运用好西方的法律,善用西方规则玩西方游戏,才能做到“以夷制夷”。

了解并掌握西方法律相当紧迫

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不但没有“以夷制夷”,还常常被“以华制华”。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台独、藏独、疆独等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在合作中用中国规则来操作中国事务,在具体竞争中屡屡让中国吃亏。相对而言,中国对西方认识则还很不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够了解西方的宪法和行政法;许多为外语人才的中国外交官,对所在地的法律了解不够,更别说有切身的西方法律实践,而这些外交官的想法和建议又往往成为政府决策的最主要依据。许多人对西方官员的认识,甚至还常用对中国官员的认识去比照。二是不够了解西方的公司法与财产法。三是不够了解西方律师的特殊性及其作用。例如在事关重大的项目上,西方人在法律条文上花的时间相对较多,而中国公司到西方经商,则经常只注重看合同商业条款而忽略当地法律,这样就容易出问题。

海外华人华侨律师团可以借重

西方的规则在明处,研究透了,便会透明起来。熟悉并善用西方人的规则,才能在与西方打交道时牢牢掌握主动权,不但西方人不别扭,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在这方面,海外华人华侨律师团有其优势,一方面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深谙西方法律,另一方面身为炎黄子孙,熟悉中国国情。固有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总希望对国家的发展有用,了解中西两套参照系统又让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民间了解西方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语

中国公派出去与法律有关的访问学者或留学生,多半学成后回国,没有西方解决过任何实际纠纷,因而缺乏西方真正的法律实践经验。个人建议,在战略上中国政府应从现在起,有计划地培养一批通晓西方法律、并真正具有西方实务经验的人才,然后用到政府里,派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去,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与西方打交道的生力军。这批人还可以与海外的华人华侨律师团一起成为中国政府和民间了解西方法律的最主要渠道,并为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下参与全球竞争作出贡献。

◆ 国家形象

世博会，中国将拿出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展品

中国科协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杨福家

世博会如同任何博览会一样有展品。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上，就有10多万件展品。但英国提供展示的场馆——水晶宫，却是最成功的展品。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还将建造英国馆，其中要建一个零碳馆，将永远留在上海。但目的不是向人们显示一个展品（硬件），更主要是表明低能耗、零排放的科技发展趋势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软体）。笔者赞成这样的说法：上海世博会上最大的展品将是我们中国的国民素质，并且与奥运会相比，世博会历时更长，经受考验的时间也更长。

目前，上海已作为一个国际化大城市屹立于世界。但站在上海的马路的十字路口，步行过一次马路，就会发现：在上海的马路的十字路口，不仅很多行人对红灯视而不见，就连机动车都可快速冲过。当救护车拉着警报声驶来时，在文明国家里其他车辆会立刻自动让开，但在上海，周围的车辆却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拥挤的人群等候上公共车，往往不排队。到世界各地公共场所，凡见到许多抽烟的、大声喧嚷的，往往是中国来的，在外工作的中国人常为此脸红。但使人更脸红的是：成群留学生作弊被开除；造假文凭、假成绩单，甚至颇有名气的大学的校长，竟抄袭国外论文来报奖，还要申报院士。我国的国民素质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扩大。

我个人认为，提高国民素质最重要的办法是发展教育。任何国家，教育都有这样的中心目标：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但受到世界尊重靠什么？除了靠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充分的民主、完善的法制、高尚的道德之外，最根本的还要靠国民素质。

发展教育的二个基本点应该是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力求教育公平，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也是各级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责。个人认为，发展中国教育必须转变三个观念，并且要有相应政策配合：重视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正确对待各种学位，学生的兴趣爱好决定了最适合他（她）的学位；减少名校情结，对学生来说，适合他（她）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学校。

发展教育有四个主要要素：一是财力、物力（有形资产）；二是人才（人力资源）；三是文化（文化内涵）；四是体制。其中文化内涵是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进步是基于文化的进步，一流的国家不仅有一流的经济，还要有一流的国民、一流的文化。发展中国教育，个人认为还需进行五项改革：高考制度的改革（自下而上）；评估制度的改革（自上而下）；教育方法与内容的改革（上下配合）；教育结构的改革（自上而下）；教育体制的改革（自上而下，挑一批单位先试点）。

高考制度不改革，素质教育是句空话。改革的关键应该是三权分立：教育部管政策、管监督；独立考试院管考试；学校管招生、管录取。评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评估单位与被评估单位无利益相关。教育方法与内容也要改革：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职责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思考。教育结构改革的关键是：各类学校都重要，但要有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比例。当然，教育体制也需要调整，依然坚持党管大事，但同时需要行政权与学术权分开，教授有很强的话语权。另外，改革的要不仅是领导体制，还有同等重要的质量控制体制、师生激励体制等。

教育改革成功与否有六个看点：看各级学生特别是小学生是否能愉快地学习；看各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是否能勤奋地学习；看贫困合格的学生能否不为学费困扰；看任何一位国民在有需要时，都能发现一个可行的教育培训入口；看国民的素质有无大幅度提高；看人民对教育是否满意。世博会举行在即，期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最好的展品：中国人有着世界一流的素质！

中国的国家形象应具备那些内涵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钱宏

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国家形象，应该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长远看，国家形象塑造要服从国家发展目标，营造建设与发展的良

好国际、国内环境。一个多民族意义的国家概念，首先应该是种文化标识，一种文化形象。在公共外交意义上，每位走出去的中国人都犹如一张发出去的“文化名片”，而且，公共外交涉及的人群远远大于政府外交。如何与外国人交流，如何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崛起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形象？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对于中国来说，在和平、发展这一现实的国际主题之上，还需要一种更高的哲学精神主题来完成“超越与整合”。只有不囿闭于地域与历史的视野，超越当下存在的问题，又同时能整合前人的智慧，创新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国才会真正形成大国公民的文化形象。复兴，远不只是整体经济的强大，更是一种文化复兴，是良好的中国形象的复兴，是崛起的中国处世哲学的复兴。我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还应包括这十六个字的内涵：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1、全球视野

天下大道就是社会共生。由于互联网、卫星传播、跨国经济和文化频繁交流，地球村已不是一个概念而成为活生生的实况，世界再没有什么东、西、南、北，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应倡导“全球视野”来作为审视国际社会的起点，既富有东方文化底蕴，更能毫无阻隔地超越自身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资格、有能力、有胸怀整合色谱斑斓的世界文化，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2、东方情怀

全球视野离不开自身固有文化的精神支撑——东方情怀。中国人需在全球复兴富有东方情怀的文化形象。当然，这种东方情怀也是对内的，讲求人格尊严、国格尊严、文化尊严，让事实上的官场文化、商场文化、艺（娱）场文化、社区生活等等没有那么复杂。那么，中国的地缘政治、人缘政治，乃至整个生产、生活、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将为之改观，民主与法治运行于国中，更是自不待言。

3、善待他者

中国人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智商和情商，还需要唤醒内在的灵商，需要自己的“世俗上帝”。因为，人类面对的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人性的危机，价值的危机。离开健全的人伦关系、人情关系，就没有了人生，也没有了社会。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核心命题，依然是华

夏先贤大哲提出的良心、良知、良能。此亦即海外华人所说的“良知教”，这一理论归结起来就是“善待他者”。今日中国人，应当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善待、尊重他人的人格形象、国格形象（包括外交形象）。

4、和合共生

如果说“善待他者”还有目的，那么就是：普天之下，和合共生。今天，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有三大融合：一是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增长的极限”与全球融合，一是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里的“对抗的极限”与天下相安，三是文化生活领域的“施恶的极限”与全民身心灵安顿。和合共生的第一步是“和解”。最后则要完成中国人的文化形象塑造，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与世界文化文明的超越与整合。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我相信会有这一天。

◆ 和谐社会

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难以壮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当前，中国社会一大热门问题是财富的集中。关于财富集中，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大家都认同的数据，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共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社会阶层顶端拥有的财富已接近美国，但大多数公民的财富收入却像拉美国家，或者说缺少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过度的两极分化，也使有钱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社会底层的消费严重不足形成特别尖锐的对比，导致社会大多数人的不满以及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因。

从社会结构来说，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在欧美国家，政党轮替是稳定社会的民主制度；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泰国、菲律宾，西方式政党轮替却成了社会暴力和政治恶斗的根源，这些国家也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同时，新加坡一党执政，社会也依然稳定，并被认为是民主

国家。归根结底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以及支持。社会财富顶层永远是极少数,但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却可能是社会主流。中产阶级的庞大既意味着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又意味着向社会大多数保证了通过知识、教育、才华、努力改变贫穷的可能性,进而形成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基础。

中产阶级缺乏结构性的基础

培育中产阶级曾是改革开放一项重要目标,但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反而越来越糟糕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实际情形是: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社会公平,二次分配也很难促成社会公平。

中国初次分配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国家企业的垄断和中小企业的欠发达。比较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到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私营企业甚至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而当地中产阶级的经济依托也正是中小企业。但在中国内地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是国有企业占有四分之三资本。

当然,并不是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本就会有问题,中国过去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模式。但是,国有企业占有了主要资本,为中国创造七成以上以及九成新增就业机会的却是中小私有企业,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财富的增加在初次分配上并不能惠及大多数就业者。如果国有企业自行决定工资标准,不向政府上交大部分利润用以二次分配,更会加深社会收入分配的差异。同时,许多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资源的竞争,还会制约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也就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国进民退”。到今天,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包括资本和政策等各种困局,中产阶级缺乏结构性经济依托。

“新三座大山”的制约

政府某些社会公共政策不够完善,还常常变成“掠夺”中产阶级的有效手段,最典型的就是“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和上学)。即使社会二次分配(例如社保体系)能够保证全民公平性,由于房价高昂,要耗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大半辈子的积蓄,中产阶级就会被贫穷化。在很多地方和城市,也早就存在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或者说,中国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白领,其实大部分只是贫穷底层,这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莫大威胁。

结语

国家总理温家宝多次公开强调社会如果财富过分集中会产生很多问题，这表明领导层对此有所重识。中国过去改革成功重要一点是改革的渐进性，渐进保证了足够时间来消化。但很多激进化因素正在产生，财富两极分化严重正是其中之一。只有中产阶级壮大、解决两极分化，形成有利改革的和谐社会环境。要改变现在这种局面，就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应付：在二次分配上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这是社会底层所必需的也是必须享有的基本人权；其次，还要改变经济结构，改革国有部门的治理机制和效能，同时从法律、政策层面为中小企业、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公平的环境，进而能从初次分配入手来解决财富两极分化。

◆ 产业升级

吸引人才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陶庆华

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迷以及外需疲软，正在促使中国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实际上，随着全球分工协作以及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剧，许多创新、创意产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例如全球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的增长就一直没有停滞。以中国的软件与外包产业的领军城市大连为例，2008年软件与外包产业的销售收入已超过300亿元人民币，2007年，英特尔公司也开始在大连建立亚洲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其硬件产业的增长也在延续。

但就像在全球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市场上，大连与印度的班加罗尔存在差距一样，中国正在发展的高科技以及创新、创意产业，也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在自然科学，中国一直缺乏重大的能引领时代趋势、开拓新兴产业的原创性成果，中国引以为豪的“两弹一星”以及航天科技，准确说只是在重复美国已经实现的研究成果；在经济上，中国也只是个低端制造业大国，在文化上，也输出不了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思想、文化、观念。

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知识经济最重要

的生产力资源,不是土地、机器、设备,而是人才。但是,自身培养人才实力并非世界顶尖,却希望成为世界知识经济、高科技的中心,就不能不学会引进人才。例如大连能够成为中国软件产业的中心城市,就与其引进人才的战略分不开。大连通过建立“官助民办”的创业园、举办十届海创周等,引进了大批人才,在大连高新区由海外学子创办的科技企业超过四百家,接近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近一半,高新区推出的“大连研发”的软件产品也有一半来自海归。当然,影响大连成为全球软件与外包产业中心的瓶颈,正在于高端人才的不够:大连缺乏能领导研发以及企业产业化的高端人才,也缺乏能带领企业进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高端人才不但必须要有优秀的理论水平、良好的专业背景,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出色的业绩,这不是几年大学教育或者靠高校扩招就能解决的。事实上,即使是教育最发达的美国,也不完全靠自主培养来解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在硅谷可以看到大量来自中国与印度的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美国每年还接纳14万杰出人才优先的职业移民。当然,其中那些中国出去、分布海外、对祖国深具感情的高端人才,也正是我们重要的引进对象。

目前,制约中国完成产业升级、并成为全球知识与科技经济大国的根本因素,正是高端人才的不足;企业走出去,在国际竞争中屡屡失利,也正是因为国际化人才的缺乏。因此,中组部出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可谓恰逢其时,是中国参与全球人才竞争、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积极对策,意义非常重大。过去,回归的优秀留学人员已经为中国的新经济、高科技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以“千人计划”的决心与魄力,必能引进更多高端人才,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作出非同凡响的贡献。

竞争人才,也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策环境、产业环境等各方面的竞争。个人建议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应通过制度化建设来体现对于人才的重视,进而能够保证中央与地方、现在与未来的引才工作协调一致;其二,建立人才评估的系统机制,由组织、人事部门领导、专家和专业机构为评估主体;其三,保证人才引进后放到合适的平台上,事业发展是留住人才的关键,也是引才工作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其三,应从自身需求出发引进人才,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的目的性、针对性,否则形成引才资源和人才的双向浪费;其四,建立人才跟踪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及时解决人才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调解人才与引才单位可能发生的纠纷等。

◆ 农村改革

三农政策改革的新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院长 温铁军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日渐提升高度，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1956年周恩来总理宣布的追求农业现代化的大目标，仍然挥之不去，但按照苏俄模式的农业现代化，或者九十年代学习过的美国模式，也并不是可以追求的目标。

在工业化、城市化驱动下，世界农业正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所谓“三分天下”，是指发展现代农业的三种模式与道路。这个世界真正能够实现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的，不超过十个殖民地国家：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一片广袤的原野上，大拖拉机开过去，一切就解决了，这种模式只适合殖民时代留下的一个空前宽松的资源条件的国家，它适合福特主义的大生产逻辑，并且被美国引领着。这种规模经济当然令人羡慕，但意味着整个殖民化过程得再来一遍。

被大家视为楷模的是第二类欧盟农业，欧盟农业至今是典型的现代化市民农业，60%以上欧盟国家的农场主早已不是农民，而是市民，是中产阶级中下收入者、小书店老板、中小学教员、政府小公务员，这部分人因无力进入高端的资产市场，于是走向了低端的农业，这也是欧洲今天成为世界绿色运动策源地的重要基础，因为这部分人很多是高学历，很多有精神追求：那是我休闲度假之地，也是我告别都市喧嚣之后陶冶心性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欧洲近些年来的绿色主义运动，因此导致欧洲国家农业上的贸易壁垒。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这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

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走的模式，叫做日韩模式，其实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没有被彻底的用欧洲的、非洲的方式殖民化过，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人口非常密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这种农业一定资源高度短缺，例如中国只有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人口。如按照美国模式、加拿大模式，那不意味着离开地球？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农业一定不可以用同一个政策,同一个思想,同一个理论体系来指导。而且,大家不要盲目崇拜美国模式。有人会说,美国只有2.7%的人是农业人口,但事实不是,美国农场主的耕地上可能一家人雇着三四十个农工,从墨西哥来打工的。农工会算为当地农民吗?不算,那只是季节工,不算农民人口,因此美国只算农场主人口,然后拿来跟中国农民比,这样比出中国农民多么落后,合理吗?然后还说中国的农民一定要改成专业化,但看看欧盟,农场规模比中国大几十倍,它专业化了吗?也没有。

中国应该要向日本、韩国学习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韩国也是人多地少,但他们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者说怎么让农民增收?一定是让农民能进入所有领域,给足够的优惠。为什么日、韩95%以上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非农业,而这又来源于政府允许农民合作社以最低成本、最低门槛经营,并把农村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旅游、饭店、房地产等全部收益大多免税,才导致95%以上农民进入合作社。也只有把所有涉农的可能产生的收益都让给农民,农民才能保证有足够的、非农业人口买得起的粮食。我们都知道粮食安全不是私人问题,但从事农业的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社会平均收入,没有跟市民、工人、公务员一样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就会是私人问题?他们凭什么承担社会责任?只有大规模的公共投入,这能合理地形成农村相对稳定以及粮食安全,而不完全是靠学习西方的机械化、产业化。

其次,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社会必有交易成本,如果采取的方式不恰当,会加大负面效果。因为我们把一个城市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照搬到乡土社会,就发生了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反过来建筑经济基础的毛病。东亚属于典型的小农村设置经济,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讲皇权不下乡,并不是皇帝老儿不想管到农民家的炕头上,而是成本太高,为农民高度分散。

所以,中国要发展农业,还必须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完成乡村治理结构建设,但这不是搬一个现代制度来就能完成,必须根据中国农村的国情与经济形态才能解决。

◆ 教育改革

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杨东平

近代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向上,形成了现代教育功利和非功利两重价值、目标。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应当相辅相成,从而保持教育协调健康的发展,防治教育的失衡和异化。我国80年代教育的重建,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而发生了宏观转变。90年代中期以来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又得到迅速发展,使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与此同时,在实现国家主义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并举,“官场”和“市场”的价值观并行,教育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异变,乱收费、应试教育、择校热、教育不公平、新“上学难、上学贵”等,使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提出将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以及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优先发展、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正在成为新的价值观。这非常有意义,但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远未形成共识。我认为,需要重新审视以超越政治本位和教育的经济主义模式:

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宗旨

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意味着教育应当明确以人的发展为本,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因此需要改变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将身心健康、人格陶冶、道德养成、文化传承等放在教育的中心,恢复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

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以人为本”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专家,提升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能力,还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造就一代身心健康、有道德、有情感,能够自立于社会的现代社会的公民,营造较高程度的社会文明,通过公民教育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主素质、公民道德、法治意识,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现在的高考教育很容易走向要求学生门门优秀的“平均发展”，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学生”不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每一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上，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这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不应将学生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实行大众主义的教育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将构建终身教育体制和学习化社会。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绝不仅是为了选拔少数尖子生，为了能够升学的学生，而要面向全体学生。政府要为城乡人民提供基本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

应试教育的哲学基础是知识本位、学科中心、学历主义的，方法是死读书，读死书，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基本特征是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书本与实际相脱离。需要改变这一完全不适合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陈旧传统，重建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重视教育的实用性、适切性，确立生活本位、能力本位的价值，围绕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民主的教育、活的教育和有用的教育，走向“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结语

当前，迫切需要改变教育中重理轻文、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的状况，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要改变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偏重知识灌输，偏重考试和分数，独重理科和英语的倾向，重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服务社会的公益心、学会生活的能力等等。此外，还需要补充新的教育内容，如开展公民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跨文化的国际理解教育、生命教育等。

◆ 经济转型

谨防中型企业搭小企业优惠政策便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为缓解中小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困难,近期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的优惠政策。要落实这些政策,个人认为,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对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区别对待,是重要的一环。

我国小企业的定义比较接近国际上中小企业的规定,但在我国称为中型企业的,在国外都被划为大企业的行列。我国中小企业的划分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很不相同,根据2003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在工业领域,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4亿元以下的企业都划为中小企业。在建筑业,职工人数高达3000人还称之为中小企业。国外中小企业的划分就比我们窄得多。例如在欧盟,职工人数在250人以下的企业,在美国,人数在500人以下的企业,才能被称为中小企业。在越南,中小企业的雇员要在300人以下。印度则把资产不超过1亿卢比(合人民币1400万元)的企业称之为中小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把中小企业混同起来会造成很多政策误区。例如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上半年新增的7.37万亿贷款中,大型企业得到了其中的47%,中型企业得了44%,而小企业才得了8.5%的贷款。然而,在银行公布这一数字时,把中小企业合起来算,这就成了中小企业得到了53%的新增贷款。各国政府给中小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小企业能够创造出大量就业。我国的就业机会也主要是由小企业提供:例如我国就业的70%,新增就业的90%,都是由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下的小企业提供的。但是,大中型企业仅提供了10%的新增就业,却拿走了91.5%的新增贷款。仅从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来看,国家都有责任帮助这些小企业发展。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然而,由于在政策中往往没有区分中型企业与小企业,这些本应该给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大部分却都被中型企业拿去了。从某种意义看,也扭曲了政策的效果。这也多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小企业并没有感觉到政策的

温暖的重要原因。很多部门与金融企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宁愿把这些优惠政策给中型企业，也不愿意去花功夫、花力气去为小企业服务。

促进就业是民生工程的核心，也是保证我国内需经济能够启动的关键所在。在落实最近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时，要防止中型企业再搭便车，一定要让小企业这次真正能得到实惠。为此，笔者建议重新修改中小企业定义。实践说明，2003年的中小企业划分过于宽泛，弊病很大，可以考虑使重新划分中小企业，使我们的中小企业的划分大体上与世界接轨。

如果修改中小企业定义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金融危机下很多小企业急需帮助，可以考虑先在最近要公布的优惠政策中把中型企业的字样去掉，或是严格界定哪些政策的小企业为受惠主体，哪些政策是中小企业也可以成为受惠主体。今后，在统计部门与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数据中，应该把中型企业与小企业分开统计，让社会与各级政府真正了解各类企业的处境，使未来的政策制定更能对症下药。

◆ 可持续发展

为中国的未来——做好战略转变的准备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袁剑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养成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依赖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都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一直持有审慎怀疑态度的观察家们，也在21世纪之后彻底接受了中国经济作为一架“永动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习惯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动摇，反而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而变得更加牢固。显然，这种乐观已经成为一种危险。

危险并不来自经济高速增长本身，那是个好事。但危险来自于习惯性的依赖思维：在过去三十多年，尤其1990年代之后的20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将其战略与策略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才有足够的税收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民众才能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也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对于这种战略，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民间都出现了反思声浪，但遗憾的是，危机的到来不仅仅没有让我们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依赖战略，反而加深了对这种“兴奋剂”的依赖，几乎是在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增长。

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因素，但我称之为“低福利因素”。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为了经济高速增长，各级政府以及大多数企业都将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其中包括对公民权利与社会保障的压缩、压低劳动者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无视环境破坏，为了商业开发对农村、农民过度掠夺，对城市居民原有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剥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凡此种种，虽然帮助了中国在短时间内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但也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严重透支。

在过去几十年，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几个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如果没有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可能面临这样的前景：一个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前面三十年的时代。事实上，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证诸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一旦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都有一个从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转换时期。但中国的危险之处在于：我们的改革战略以及社会稳定都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前提假设的，8%的增速足以让全球任何国家羡慕不已，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到中国一半，就能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繁荣；但在中国却只能维持社会的基本运作，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如何低下。

当然，随着外需恢复，中国经济更可能是重回危机之前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但我的观点是，高速增长当然是好事，但却不能以贬抑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保障、牺牲环境资源、透支未来福利的增长模式持续下去。因为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带来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在这个意义上，“保八”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与其花费巨大代价“保八”，倒不如及早从完全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建设国家的战略中退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法治建设、重视环保与公民福利等来建设和谐社会。